

# 英国和欧洲大众体育哲学思想的变迁

伊恩·亨利<sup>1</sup>著,徐通<sup>2</sup>译

(1. 英国拉夫堡大学奥林匹克研究中心教授; 2. 华南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

大众体育作为一个口号有着相当长的历史。例如, Stephan Wassong 指出, 尽管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直到1983年才成立了用于宣传“大众体育”的正式工作组织, 但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 这项工作就已经开展起来了。在欧洲, 大众体育的流行得益于欧洲理事会1976年制定的欧洲大众体育宪章; 而英国则得益于二战后不断成熟的国家福利政策。1975年, 英国政府出台了第一部关于体育(更准确的说是关于体育与休闲)的白皮书。该文件宣布, 体育运动是社区日常必备的服务, 同时也是社会服务体系中的一个基本构成。因此, 到了20世纪70年代, 政府福利系统被认为是提供体育设施以满足大众体育需求的权威机构。体育服务也成为大众能够普遍享用的权利。

但是, 1995年保守党政府颁布《体育: 发展游戏》之后, 再未有任何关于体育未来20年主要政策的表述出现。政策的重点已经改变并且在文件中不再提及大众体育。在这段时期里, 英国的 Margaret Thatcher 和美国的 Ronald Reagan 所阐述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说成为主导。这种哲学思想倡导, 政府不再承担满足大众社会需求的费用, 甚至那些基本的社会福利需要和服务也仅因费用高昂而被束之高阁。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认为, 即使那些服务是可以负担的, 也没有这个必要。民众能够通过市场合理表达自身需求时, 政府就不应过多干预。

1992年欧洲理事会更新欧洲宪章, “大众体育”的用法被完全废止, 代之以欧洲体育宪章。同年, 英国保守党体育大臣公开声明: “大众体育”不再是中央政府的义务, 但是如果地方政府愿意提供大众体育服务, 它可以成为地方体育政策。然而这样的说法只是暂时性的, 当地方政府财政拮据时, 提供大众体育服务也就成为一纸空文。因此, 在欧洲大众体育作为口号已经过时。

但是英国公共体育服务并没有被简单废止, 体育服务的提供和资金筹集更为重要了。从国家为民众提供体育机会的基本方针来看, 体育服务已由对内在价值的认同转换为一系列外在的基本理念。

在这个报告中, 我将介绍上面所提及的趋势, 并

探讨大众体育政策的重要意义。英国的经验表明政府紧缩服务开支会产生一系列政策后果。尽管我的研究主要关注英国和欧洲, 但希望它能为当下的中国提供有益的借鉴, 特别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的中国市场。

## 1 大众体育服务的转变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 新自由主义市场理论影响着人们的观念。政府寻找改变公众组织结构和文化的办法。在急剧变化和生机勃勃的环境中, 传统慢节奏的官僚机构被认为是不合时宜的。诸如城市发展公司、工业园区等新的组织机构脱离了行政部门和地方政府的束缚应运而生。新管理主义被引入这个时代, 意味着商业的管理技巧被移植入公众事务管理。

法律要求政府对于公众体育设施管理要向社会招标, 商家可以参与竞标并获得公众体育设施管理权。体育设施管理的合同要有具体的社会目标和财政目标。竞标者并不奢求丰厚利润, 事实上只有那些能够减少公众设施资金补贴同时又能提供社会服务的竞标者才能获胜。商业的介入对于公众设施管理的影响是巨大的。无论是商业公司还是原来的公众设施管理者, 竞标获胜后都意识到应该使用一种更加商业化的管理方法以确保在与对手的竞争中获胜。

扩大的商业主义造成了公众设施管理者们利益第一的观念。这从根本上破坏了修建这些设施施行大众体育的基本理念。体育公众服务及设施补贴被那些愿意负担私人体育设施的高等社会经济群体所使用, 强制性竞争招标进一步加重了这一问题的恶化。并不富裕的群众既无法享用昂贵的私人体育设施, 也无法享用政府补贴的公众体育设施。

除了对公众体育设施进行商业管理外, 政府还施行体育彩票制度。将销售彩票所得的资金投入到精英体育和大众体育中去。1994年11月彩票开始发行, 这对体育和休闲具有巨大意义, 因为它不仅使保守党政府降低了补助金税, 而且增加了体育、艺术等的资金投入。彩票事业最终获得了成功, 据统计, 1994年到2000年4月仅英国彩票获利就达11.2亿英镑。

然而,彩票的获利不能完全满足政府的福利支出。因为资金来源取决于地方团体对体育项目的成功申办,而不是直接针对需求的政府预算。申办过程是复杂的,尤其是最初阶段,不仅要求专业资源,而且要求体育基金申请人必须负担占总项目费用35%的财政贡献。那些最需要经济支持,处于不利地位的社区也仅仅是能够申办成功,而完成后续工作相当困难。因为在目前竞争激烈的情况下,他们没有机会获得规划、会计和其它专业技能,很难能够产生35%的财政贡献。

无论是强制性的竞争招标制度还是彩票的拨款制度,在1997年工党政府大选胜利后,都进行了显著的修改。虽然彩票系统面临很多困难,但现行的商业管理和商业惯例在许多领域仍然得以保留,例如2012年伦敦奥运会日益增长的需求正在威胁20世纪中期政府社区项目的预算支出。

## 2 大众体育服务转变的理由

20世纪70年代末,体育的内在价值已不再被视为是国家投资大众体育项目的一个充分理由。我会在这里大致以时间顺序来理顺英国政策体系变迁,以及公共体育投资不断变化的基本原理及其对大众体育计划施行形式的影响。

### 2.1 体育作为促进社会稳定的工具

在20世纪70年代末,由于英国的经济问题不断恶化,政府更加关注社会稳定。失业率上升、种族主义等问题的漫延,使城市面临引起社会混乱的威胁,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初英国一些城市已发生城市暴动。人们认为体育在提供服务以改善城市紧张关系方面具有潜能。因此一些针对失业者、黑人、男青年的城市内部资助计划不必撤销,而是进行有效改组。同时,大城市中的一般体育服务项目遭遇了金融紧缩和降低成本的困难。大众体育则以牺牲一些弱势群体的公共体育服务权利为代价。那些在街头容易导致社会混乱的群体成为专门资助计划的目标,而其他不会对社会秩序造成威胁的弱势群体(老人,残障人士等)的体育服务受到了削减。

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对社会秩序的威胁得到了控制。城市暴动虽然依旧发生。但事实证明,这些暴动可以控制在局部范围内。并且政府认为这些用以缓解社会紧张关系的计划措施没有显著的效果,因此可以忽略。

### 2.2 体育作为城市复兴的工具

在20世纪70、80年代,工业能力削减是英国一些主要城市面临的问题,体育运动被看作是改变城市

形象、吸引外来投资者的一种工具。尽管有人争辩说投资体育给当地居民带来益处,但当时投资主要还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英国的两个主要城市(伯明翰和曼彻斯特)也是由于经济原因未能成功获得奥运主办权。而在1991年,谢菲尔德成功申办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曼彻斯特最终举办了2002年英联邦运动会。

以谢菲尔德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为例,从当地居民在此次赛事中的收益的角度来衡量成本和效益是很难的,因为效益和成本不是所有金融活动的本质。这次运动会的影响可以从多方面来评价,但是根据本文的论点,我会只注意到某些运动的影响。从积极的方面看,我们可以指出一个事实,1991年至2003年城市举办过总计455次体育活动(其中113项国际赛事,包括21个欧洲冠军和13个世界冠军)新的项目或以前没有专业队伍的项目,例如冰球和篮球,取得了巨大成绩(在1995年都获得了国内冠军)。不过,虽然城市积累了一些急需的高品质设施(尤其是它的国际游泳池),我们也须看到一些消极方面,特别是一些能够满足弱势社区居民体育需要的位于老社区的游泳设施,因资金被用于新设施的运行而关闭。人们不得不前往城市中心使用新的设施并支付交通费用,门票价格也明显高于原有的体育设施,而且游泳池由于赛事准备只能定期向公众开放。结果是,尽管建设了用于举办运动会的崭新宏伟的游泳设施,但是在全国游泳参与水平总体提高的趋势中,唯独谢菲尔德下降了。

### 2.3 体育作为提高社会凝聚力的工具

保守党及工党的政策性文件都强调体育在帮助青少年融入社区生活方面的作用。不过工党在体育教育、学校体育和俱乐部战略方面投入大量资金(2003-2004到2007-2008投入9.78亿英镑),这些投入解决了政府一项体育目标的资金,即提高5至16岁儿童获得体育运动的机会。因此截止到2008年,85%的儿童每星期课堂内外至少有2个小时的高品质体育课程及体育运动。作为计划的一部分,俱乐部试图在学校和俱乐部之间建立一种联系,从而提高儿童对体育俱乐部的参与,其目标是5至16岁儿童参与国家认可的体育俱乐部的百分比由2002年的14%增至2008年的25%。

此外,本届政府还为资金匮乏地区提供了资助的示范项目。2000年英格兰体育局倡议发起“体育活动区”运动,从而帮助提高贫穷和资金匮乏社区的体育参与。设立的12个体育活动区遍及英国各地,区域大小从一个双人房到整个乡镇,并且代表了英国最缺乏体育设施的地区。该研究提供了一些以前没有收集到的证据。一方面它提供在不同时间增加体育参与的明确有效的措施,并强调在经历了严重的社会和经济危

机的地区有较高的体育参与；另一方面定性评价概述了拉动较低水平体育和身体活动参与所需要的理想成分和成功因素。

#### 2.4 体育和健康

肥胖与相关疾病，如2型糖尿病对国民健康和健康服务机构的经济效益都造成重大威胁。因此，政府财政拨款广泛用于支持地方各级政府体育运动和体育休闲举措的市场研究工作，借此最大程度地把握人们体育参与的变化。“体育人口调查”是欧洲对体育运动和休闲活动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调查。2005年10月到2006年10月，363 724名16岁以上的成年人接受了调查。英国每个地方行政区最少有1 000名受访者。该调查提供了迄今为止关于体育和休闲运动最大的抽样规模并建立了一个体育及休闲调查的样本，确定了不同地域、族群的体育参与形式，并取代了先前所作的调查分析。

这篇关于英国大众体育政策的实施意义及理念变

化的简短讨论试图阐明英国体育政策是如何变迁的。英国的政治制度已从组织推动的政策议程，经过市场议事日程，最终达到目标驱动政策议程。上述强调的每一种具有不同技能的政策行为者，他们的责任是推行和实施大众体育。当前，对于服务设施巨大投入的努力已经成为显示政策干预优势的证据。但是，政策规划能否顺利实施依赖于实施者对于政策本身的理解以及体育政策和相关领域的关系（如教育、卫生、社会包容等），同时也依赖于部门之间为获取共同目标进行的协调合作。虽然在英国的地方行政部门合作是主要的工作方式，但是，对于这样一个相当于流体系统的伙伴关系，评估政策是否有效以及在何种条件下有效运作还言之尚早。

（本文系第三届社会体育国际论坛特邀嘉宾主题报告）

[编辑：黄子响]

## 华南师范大学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被确定为国家重点（培育）学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研函[2007]6”通知，华南师范大学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被确定为国家重点（培育）学科。该学科自20世纪50年代由著名体育理论家方万邦教授创立，80年代中期由林笑峰教授率领的团队进一步拓展，于1985年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是国内本学科获得体育人文社会学硕士学位授权点最早的学科之一。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该学科由学科带头人杨文轩教授，学术带头人卢元镇、胡小明、周爱光、谭华等教授带领，表现出更为强劲的发展势头，在全国该学科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该学科所在的体育学一级学科是全国“九五”和“十五”期间进入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唯一的体育学科。经过两期建设，该学科在重点学科、博士点、研究和培训基地方面实现了重大突破，科研项目的档次和课题经费均得到迅猛提升，一批学术论

文、教材和专著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并形成一支高学历、高素质、结构较合理的学术队伍，整体综合实力迈上了新的台阶，达到了全国同类学科的先进水平，部分学科处于明显的领先和带头地位，已经形成明显的学术特点和优势。

该学科被确定为国家重点（培育）学科后，将以一级博士学位授权点和博士后流动站为基础，加强国家重点学科建设；以优势学科为龙头，从人才、方向和成果方面形成厚实的研究基础，在数个重点研究领域产生一批有代表性、示范性、显示度高、密集度高的突破性成果，建成国内领先、国际有较大影响的知名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成为国内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高层次人才培养基地之一，在某些领域的研究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

（刊讯）